

中國共產黨
建設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朱汉国 谢春涛 樊天顺 主编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薄一波

题

封面题字：薄一波

责任编辑：何华章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古 蓉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朱汉国 谢春涛 樊天顺 主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18 插页4 字数417千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274-8/D·261 印数：1—3,100

定价：7.30元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成都

序

廖益隆

朱汉国、谢春涛、樊天顺主编，由10余位党史、党建研究工作者合作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史》，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我受三位主编的委托校读了这部书稿，得益不少。我认为这部书虽然是以研究党的建设的历史为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专题历史之一，但是由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是我们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第二个条件和最重要的法宝，所以《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不仅是所有党史、党建的研究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值得认真一读的，而且也是所有有阅读能力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所有立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都值得认真一读的。这部书披露了许多新材料，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全书结构也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文字通俗生动，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读性。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这部书都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

毛泽东在1949年6月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

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时说：“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

党、军队、统一战线这三件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或三个主要法宝中，第一个法宝、最主要的法宝就是党，因为军队和统一战线都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按照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的关于党的学说，党是无产阶级的，也是广大人民的领导组织，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也是广大人民手中的基本武器。列宁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所说的组织，首先是指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革命的领导组织，当然也包括党领导的军队以及作为党领导的政治大军的统一战线这样的组织。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也是这样。提出和建成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劳动群众去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战斗的共产党，这就是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正是在于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经济文化比俄国更落后、情况比俄国更复杂的条件下，提出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建设党的理论，以及建设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建设党领导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正如毛泽东所说，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三个主要经验或三个主要法宝的相互关系，毛泽东早在1939年10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说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前28年的历史证明，这三件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后42年的历史证明，党、军队、统一战线这三件，也是取得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主要法宝。

当然，要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除了要掌握这三个法宝以外，还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经验）这样重要的法宝。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提出的“干部四化”标准中，除了“革命化”是前提、“年轻化”也是重要条件之外，又着重地提出了相当于掌握现代科学文化（以及掌握先进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经验）的“知识化”、“专业化”这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四有新人”的条件中，除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三个思想政治条件以外，也包括“有文化”这样的科学文化条件。可见，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首先是全体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以及先进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经验），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条件赋予党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

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其中特别是在根据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但是可惜，从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犯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过渡等“左”倾错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在大约20年的时期中遭到了严重削弱以至完全破坏，毛泽东建党思想也被搁在一边，党的建设受到了严重挫折。

正是鉴于这个情况，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要对过去的“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本来面目，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建党思想）。

这就是说，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我们在新时期，首先是要恢复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真面目，并且按照毛泽东建党思想认真地加强党的建设。那末，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下5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显著地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5个特点。这5条就是：（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彻底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四）采取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

上述建党5条中的第一条，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和它的每个党员的根本宗旨，根本出发点。这是决定共产党和它的每个党员的性质的东西。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共产党才成其为共产党，共产党

员才成其为共产党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首先就要使每个共产党员明白，他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必须坚决克服和抵制一切违背这个根本宗旨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必须坚持立党为公，而反对借党营私。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第一条即从思想上建党的真正含义就是如此。

上述建党5条中的第二、第三、第四条，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毛泽东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一整套新的工作作风，主要是前面所说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或者叫做三个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每个党员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三个基本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是党的根本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认识路线；而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自我批评的方法，则是党赖以坚持发展真理，认识和改正错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环节。

自我批评既是坚持和发展真理，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方法，也是解决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的方法。毛泽东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新旧矛盾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他又说：“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反复地说明，党内斗争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而反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自我批评必须贯彻于党的正常民主生活的全过程

中，这就是要经常地检讨工作，必要时还要开展整风运动，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运动。

建党5件中的最后一条，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组织保证。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是党的建设中一个重大的任务。但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并且正是为了保证党内民主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严格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这些严格纪律，才能保证全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斗争中的意志统一和行动统一，这是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的。这也是列宁告诉我们的。列宁在论党的建设问题的著名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为工人阶级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这个真理，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是适用的，在他们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斗争中，同样是适用的。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不但充分肯定和始终坚持毛泽东的上述建党思想，而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或者说是提出了建党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是为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即坚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

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这个新思路，我认为可以概括为3点，这就是：（一）着重于党的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即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二）深入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用透彻说理和从容讨论的方法，来解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侵袭的问题；（三）从严治党，把那些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腐化变质的分子清除出党，用以教育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这个新思路的中心和实质是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实现党的生活民主化和加强党的纪律。

首先是着重抓党的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特别是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因为这个问题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最好的时期，即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是没有完全解决的。邓小平同志说：“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大家知道，正是这种情况，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保证了全体党员和干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而保证了1949年全国革命的胜利、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但是邓小平同志接着指出：“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这就是说，即使在1957年以前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的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1958年以后，民主集中制更受到

了严重削弱以至于完全破坏。

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的现行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他说：“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必须明确提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又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问题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总之，着重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着重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实现党的生活民主化，同时加强党的纪律，这对于新时期党的建设是最重要的方面。

其次就是要广泛深入地进行党内的思想教育，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方法解决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思想认识问题。拿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问题来说，邓小平同志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遗毒中摆脱出来，解决思想，提高觉悟。”“必须明确，不要搞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都搞过去那种政治批评，更不能把斗争的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同样要采取组织干部和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办法，采取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

与此同时，要在党内深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的正面教育。邓小平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党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是要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开展反腐败的斗争。邓小平提出了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内，要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任务。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了要从严治党。十三大报告中说，执政党的地位，容易在党内滋长脱离群众的倾向，其危害比党执政以前要大得多。为了清除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出现的腐败现象，对经不起考验的党员首先要满腔热情地进行教育。但经验证明，仅仅靠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对于那些败坏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一经发现立即处理，有多少清除多少，决不姑息。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坚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的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纪律。同时还要坚决贯彻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的着重抓党的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深入开展党内思想教育和从严治党的建党的新思路；坚决贯彻这个新思路的总方向：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实现党的生活民主化，加强党的自觉的严格的纪律。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克服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的一切困难，达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

1991年5月28日

前 言

中国共产党自1920年酝酿筹建起，就非常重视自身的建设工作。在幼年时代，党就把“党的建设”列为重要的一章写进了自己的章程；在战争时期，党又形象地把“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一起誉为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更是把“党的建设”列为自身的首要工作。如今，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的建设，已由初创时只有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拥有4900余万党员的大党，并十分自豪地迎来了自己的70岁寿诞。我们编写的这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叙述的就是70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身如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建设、不断壮大的历史过程。

党的建设，历来是党的整体工作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研究，与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密不可分。离开党史，党的建设史也就无从谈起。然而，二者间又有着严格的区别：中共党史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

展开的；而党的建设史研究则主要围绕着党自身的发展、变化而展开。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指导。70年来，党制定的历届党章，通过的所有关于党的建设的法规和文献，无一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建设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党的学说的发展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党的学说的发展，是党的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讲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不讲党的学说发展是不行的。然而，二者间也同样存在着区别：党的学说史是反映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过程；而党的建设史，则重在反映在党的建设理论指导下的建设实践，并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进行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主要内容。

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它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为指导，进行自身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等各项建设的历史特点及内在的联系，从而探求其建设发展的规律。

鉴于上述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特点，我们在勾画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体系框架时，作了大胆的探索，力求把它与一般党史及党的学说史区别开来，从而能准确且又全面地反映出党的建设史的特征。细心的读者，已从我们的纲目中看到了这种“区别”。我们后面的行文，将会更清楚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与一般党史、党的学说史的联系与区别。

编写《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在目前的党史研究中，仍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原则：第一，实事求是；第二，大胆探索。但由于党的建设史研究尚处在初创时期，体例编排上尚无章可循；加之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有

许多问题尚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要准确无误地作出历史的结论还有一定困难。因此，在我们的行文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缺陷乃至错误，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组、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博物馆等单位的部分同志共同编写，朱汉国、谢春涛、樊天顺主编。

各章执笔者：

第一、二章 朱汉国；

第三章 田百春；

第四章 耿向东、朱汉国、谢春涛、齐鹏飞；

第五章 王宗荣；

第六章 王 东；

第七章 谢春涛；

第八章 温乐群；

第九章第一至四节 樊天顺；

第九章第五节 何毅亭。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从事党史、党建研究专家的指点和支持，特别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著名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同志对我们的写作给予了指导，并撰写了序言。在此，特向他们致以谢意。